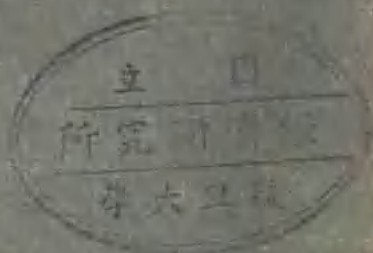


社會科學叢書

550.71
2172
2

政治經濟的基礎

比雅德著
張金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550.71
2172
2

書 叢 小 學 科 會 社

C. A. Beard 著
張金鑑 譯

政 治 的 經 濟 基 礎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 引

這本小冊子是集合一九一六年克拉克基金社 (Clark Foundation) 請我在阿赫斯特學院 (Amherst College) 所作四篇講演稿而成的。除第四篇曾經依照最近的政治經驗把牠完全修改過，其餘的三篇都照原時講稿重印，很少有變改的地方。這偶然重印的理由亦很明顯，這裏不必再說了。

比雅德謹識於新密爾府，時在一九三一年十月

(C. A. Beard, New Milford, October 5, 1931)

譯序

經濟是人類爲滿足生存慾望時對生產技術與手段的獲得上所發生的各種行動和事務。政治就是對這種行動和事務的聯合統制與強制管理。人類爲維持生存，滿足慾望，自不能不有經濟活動。但要想這經濟活動得到較大的成功和長足的進展，亦不能不憑藉人羣強制聯合努力或政治活動。足見政治是達到經濟目的時，所應用的手段，所依附的憑藉。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在生存競爭的過程中，這兩種東西總是相生相濟的相依爲命的作繼續不斷的糾纏前進。他們決不會亦決不能分離開。如果脫離開經濟談政治，那政治便成爲無生命無筋肉的骨骼架子。如果拋棄了政治談經濟，那經濟亦必成爲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樓閣。

嚴格的說，世界上決不會有離開經濟動機的純粹政治活動。每種的政治事件都包含着重要的經濟因素和意義。上次歐洲大戰的爆發，決不是個宗教、國體、或種族的問題，完全是市場和原料奪取的經濟問題。遠點說，那普法戰爭的真實原因，不是爲爭奪阿爾薩斯和魯蘭兩地的富源麼？

是那所謂純粹宗教戰爭的十字軍東征，骨子裏亦是歐洲人要維持東方的商場，或打通東進的商業上的交通大道。秦始皇築萬里長城真是爲子孫定萬世帝業麼？隋煬帝開貫通南北的運河，真是爲乘龍船遊幸江南麼？漢武帝唐太宗的大張撻伐，真的因爲他們的天性好窮兵黷武麼？事情決不是這樣的簡單。都是因爲當時的經濟環境和需要，逼着他們不能不那樣的去作。這種的事實，真是舉不勝舉。我們要用這樣的眼光，把入類的政治史，重新解釋一遍，確是件最有價值的事。

就政治組織的形式演變說，亦是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和影響。在漁獵時代的羣衆社會裏便產生隊羣式的圖騰組織；在游牧時代，人羣組織便由圖騰社會變爲宗法式的酋長制度，嗣後社會經濟進步，政治組織亦隨時演變，到了農業社會時代，就有世襲君主政體的應運而生。產業革命成功後，社會經濟發生根本變革，於是民主政治便亦突然興起，代替了君主政治的地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發展到現階段，因爲勞資鬭爭的劇烈，民主政治的基礎，日見動搖，共產式無產專政和法西斯的一黨獨裁，便又氣焰漸高。

政治和經濟間具有不能分離的密切關係，彼此相互影響相互限制，構成人類演進史的輪廓。

比雅德(C. A. Beard)所著這本政治的經濟基礎 (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對這政治與經濟相關的問題，作有系統的簡要的分析 and 描寫。立論正確，觀察獨到，確是難能而可貴。譯者深信應該把他譯出貢獻國人，使人們對於支配人類進化的基本因素、力量、和相關的方式，能得到適當的明瞭與認識。

這書在第一篇把亞里斯多德、馬克維利、洛克、馬迭生、加利鴻和威白斯特六大政治家的思想作簡要的引釋，證明政治組織和財產分配具有密切關係，並指出革命的爆發，都是由於經濟利益衝突的結果。第二篇把數世紀的歐美政治演進史作簡單的檢討，指明在政治組織中都承認了經濟階級或組別的存在。在第三篇裏說明天賦人權平等的政治理論產生的原因和經過。第四篇是描寫平等的政治理論和不平等的經濟事實所演成的衝突和結果。

這書對政治與經濟相關的理論和事實，作了個縱的分析。書後又附譯龐氏 (M. J. Bonn)所著經濟與政治 (Economics and Politics)一文，對現時政治與經濟相關的情形作透關的橫斷觀察。與前論各篇相互補充發揮，使這問題的各方面都得到描畫無遺，湊成完璧，更覺可喜。

在行文上譯者雖力求信達，總期不失原著本來面目，但限於才力，錯誤處想亦不能完全避免。還希望讀者予以寬大的原諒和誠懇的指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孟春三月譯者張金鑑識於古仁城

新版序言

這本書如果說是有點價值或重要的話，那就是在於牠初發行時的預言性質，亦就是以歷史事實爲根據，這種預測表現了牠的高度準確。一九一六年我在阿赫斯特學院所作講演的基本論斷是採取了馬迭生 (James Mathison) 的主張，說：『文明社會裏分裂成許多的經濟組別或利益，這種劃分是根據各人所有財產及公私職業的程度和種類去決定；政府組織的形式就是建築在這樣的社會形態上，所謂政治亦就是關於這種經濟利益間各種衝突。』

經過十七年的經驗與研究，我的思想對於這種主張不但絲毫沒有動搖，而且越發堅定了。我原來的論斷並不是作必然結果的預言，不過是就政治制度政治哲學檢討後對歷史敘述上所得到的定理。當時有銳利的批評家曾指責我的觀念不確定，並攻擊我是相信『經濟人』理論的。現在看起來，他們應該悔悟他們的指責，並反對他們的攻擊了。

在任何政治和歷史的解釋上，不正確是難以避免的，因為處理人類事務與處理物理問題，具

體的說與水電機器的管理是不相同的。誠然，有一派的歷史學者總相信把充分的事實收集起來，人類歷史的全副便可以以一個單簡的數學公式或各式的方程式包括了去。所以他們以為在政治和歷史上並沒有所謂不確定，政治歷史都能以機械化。我敬仰的教師鮑偉爾 (Frederick Y. Powell) 在牛津大學教授現代史的時候，曾經告訴我說：『歷史並不是機會或幸運，亦不是像教會所說的是「上帝的造化」，然而是一種定律，這定律的作用與機械學生物學裏的定律是完完全全一樣的』 (見 Oliver Elton, Frederick York Powell, Vol. II, p. 3) 亞當士 (Henry Adams) 曾為尋求這定律而努力過，並且說當時的歷史學家都值得他的敬重，因為他們都努力去追求在歷史上能夠有像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的偉大發現。但是現時還沒有人追求着這樣的歷史定律，亦不能把歷史純粹機械化，不確定的批評亦還不能逃避。現代歷史學界的思想家很懷疑一切歷史上尋着各式方程式的可能性。有很多人確經拋棄了人類現象與物理現象相同或相似的假設。然這亦並不能否定根據事實觀察的歷史底實在敘述。歷史的一切我們雖然不明瞭，但有很多的事是已經明白知道了。在這已經知道的事項裏，無疑的，離開了經濟的政治學確切就是

一種空虛的怪誕的形式主義。

政治和經濟是錯綜交織底複合物，亦好像瑞色列（Kurt Reizler）說的一樣：『歷史是觀念和利益永遠追隨着時代向前奔放的糾纏體。』雖然在人類事務中，找不着機械的準確性和固定性，假定知道了一個社會文化發展的階級和當時的意識形態，便可以大概的描畫出那時經濟機構的輪廓，亦就像一個物理學家從有決定性的事態中能推算出未知的現象；如果知道了那時代的經濟機構，亦便可以概括的推論到那相關的意識狀態。所以我說，如果不儘量的利用充分的知識去檢討那已知的經濟關係，要想對政治問題有什麼認識或決定，那是不可能的。那就是說，在人類社會現象裏，有種必需的廣大的生物和經濟園地。雖然這園地的界限還不能絕對的劃定，我們要想適當的處理我們的事務，便應該盡心竭力的去耕耘開拓這必需的大園地。這種必需的園地若是不存在的話，那國會的參眾兩院也許能來一個聯合決議案，把全美國的人民個個變成富豪。

那麼，在哲學的意義上我不是亦不會是信仰定命論的人，無論從這名詞那一方面的解釋來

講。在我所著一九一三年出版的憲法的經濟釋義（*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一書裏（p. 18）曾經說過：『有一些重大的世界進展，雖都是經過了各個聯串的歷史事件向前演變，但是那最後的原因仍然是在我們的視線以外。』同樣，爲了種種理由我亦決不會相信『經濟人』的說法。因爲這樣纔可以使他處理他的公私事務時比較一向要聰明些。

若是根據這書出版後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重寫一過，我自當有不少的細微修正，但我認爲決沒有理由在重印時去變更我那根本的觀念。

若是對那事前的經濟情形和目的沒有根本的研究或參考，我認爲任何讀者都不會相信對蘇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發展，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德意志希特勒主義的爆裂，美國新政的出現，能有適當的解釋，使那頭腦清楚的人得到滿意。自一九二一年來，這等事變的發生，在我看起來亦不過僅僅是亞里斯多德後政治哲學家所主張的重大政治觀念的證明罷了——這些觀念亦就是在這本書裏所簡要提出的。這些事件並且證明了人類爲搜尋安全或至少是社會暫時和向那政治經濟制度求適應所作的永久努力。

在書中對俄國所說的一些預言，這裏可以略爲補充一兩句。我對蘇俄政府使農業社會化的力量未免估計得太小，這是顯然的。把那農業區域變成驚人規模的大農場，現在仍顯然的有很多的困難。蘇俄政府採用了高明的適應，她已經放棄了高度的集中組織，而贊成那個人的和合作的經營。不過在別的幾點上，我的預測都由所發生的事實證明了。在一九二七年蘇俄共產黨黨員總數有一、二〇〇、〇〇〇名。官吏和公務員佔六〇〇、〇〇〇名，農民佔一五〇、〇〇〇名，工廠的工人佔四五〇、〇〇〇名。按照一九三〇年的統計，蘇俄儲蓄銀行的個人存款總計有七七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團體和合作社的存款除外），官吏和公務員的存款數佔去了二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工人佔九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餘的數目是農民的儲蓄。（見 A. Rosenberg, *Geschichte des Bolschewismus*, pp. 153, 229）再說，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間內債債券持有人的數目從一〇〇、〇〇〇人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見 A. Willehn, *Internationale Finanz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Europäische Gespräche, October, 1928*）這些布爾什維克的『資本家』比較那一九二九年持有多少有價證券的幾百

萬美國勞工和農民『資本化』或『安全』的程度，到底是少呢還是多？這真是思考推敲上的一件極有興趣的事。

這些數字的引證不是在批評蘇俄的制度，而是藉此更以確切證明，就是在確認無階級存在的社會裏，亦因為職業或所有而分成了多少經濟組別；並且證明了那財富分配的老問題得不着自動的解決。當像現在的資本家就是都被打倒了，那財富分配縱不成為政治爭辯論題，仍然繼續是樁重大的事體。若說，除開了這個永久的政治苦惱，旁的部分是個可樂觀的前瞻，但是這一部分我們還沒看得見啊。

比雅德識於新密爾府時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目次

第一篇 哲學家的理論·····	一
第二篇 經濟組別與國家機構·····	三〇
第三篇 政治平等的理論·····	四八
第四篇 理論與事實的矛盾和結果·····	六六
經濟與政治（選錄）·····	七六

政治的經濟基礎

第一篇 哲學家的理論

這個學術講演社的創辦人們很希望對控制社會命運，使能達到高尚目的地所用的方法和方式作繼續不斷的前進的永遠的搜尋。一個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或傳襲都和這樣的搜尋或追求有相當的關係。現代的人們且不提，那神祕的柏拉圖、聖哲的亞里斯多德、文雅的穆爾（Sir Thomas More）和勇敢的康道塞（Condorcet）對於這個神祕性的社會鉅鑑，都有過很深遠的追求和搜尋過。他們的努力的结果，都成了無價寶的社會遺業。

驕傲的鮑克（Burke）亦同樣的認為這個論題是值得拿他的聰明財力去研究，但是不久他停止了，並且承認是失敗了。他說：『我很懷疑人類歷史是否進步到一個完備的境地（如果是能夠的話）使我們根據着去確定什麼是影響國家命運的內在原因底真實理論。我對於這種原

因的存在和效果雖然決不否認，但是這些內在原因究竟是有限的、不確定，比起那外來原因的起伏和影響更為深奧，更難追尋。在政治的檢討上，我們要想找出任何一個實際的原因可見的勢力和牠底已知效果的比例關係，常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終於不能不把這問題的回答，歸結到祇是機會的效果，或者虔敬點（也許比較合理點）說這是偶然的穿插物並且操縱在不可抵抗的「大造化者」的手裏。簡單的說，鮑克因為碰着極複雜可厭的社會生活事實，和中古僧侶所謂神罰的『黑死病』慘禍底逼迫，纔這樣失望的大聲疾呼，說這只是『天意』（*Deus vult*）。

在自然科學的園地裏，這樣的承認，就是知識辯證的破產宣告。這園地裏因為有堅毅和貫徹的搜尋或研究，無畏的殘酷的對物質世界得着進步的征服和控制。物理學和化學上的這種搜尋或研究竟能以造成了機器時代，放出了新的可怕力量，把舊的社會秩序基礎分解了，現在幾乎對社會本身的崩潰也產生了威嚇。照現在世界的情勢看起來，人類是被那殘酷的力量緊握住了，這種力量縱使不至於征服人類意志，也許會毀滅世界文化。到最後我們也許會同樣的像鮑克自認我們的追求和研究是沒有結果的。縱使到了那時，我們亦還要彈唱德國大詩人亥因（*Heine*）

的詩調，說：

『因為常常愛追問，

Also fragen wir beständig

人家索性撮把土，

Bis man uns mit einer Handvoll

將我們的嘴口堵。

Erde endlich stopft Mäuler,

難道這就算解答麼？』

Aber ist das eine Antwort?

這樣，那永久的追求或搜尋使繼續的向前進行着。每個追求者或搜尋者都要碰着關於這問題本身的兩種相衝突的學說。密爾 (John W. Mill) 在他的名著代議政治裏對這學說有過簡要的敘述。一派說，所謂政治亦就是人的管理僅是個發明的問題，是在決定用什麼最好的和適當的手段去達到我們所期望的目的。旁的一派說，政治不是人類所能選擇的事體，而是必不可避免的自然發展，在這種發展裏，人的意志是不發生作用的。

我們雖然應該接受密爾的說法，但若是把這問題推究到能站得住和論理學的結論，這兩派的學說都是不能夠維持的，不過在這兩派學說的折衷處尚許有重要真理的存在。人類在長久期